

徒步·人物

筹款要花些小心思

■ 本报记者 闫冰

见到 crom 的时候,他刚从美国参加了为期七天的“艾滋骑行”(Aids Life Cycle)活动,每天在烈日当头下暴晒,crom 的皮肤变得很黑,但是他并不介意,反而觉得这样是健康的肤色。

每年爱滋徒步的筹款冠军,都会被送到美国作为“艾滋骑行”的志愿者,观摩、学习,为整个活动服务。“艾滋骑行”已经有 21 年的历史,几乎成为了美国一年一度为艾滋病宣传倡导的传统节目,参与者利用一年时间自发筹款,筹到 5000 美元即可成为骑手,在每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,骑手们在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下,从旧金山一路骑行向洛杉矶。

刚刚结束的 2014 年骑行活动,一共有 2300 位骑手,600 余名志愿者参加,其中个人最高的筹款金额达到十几万美金,整个活动 2013 至 2014 年的筹款额超过了 1500 万美金,所得款项用于支持帮扶艾滋病感染者。“这样的规模真的很令人惊讶。” crom 说。

志愿者的辛苦

800 多公里的路途,crom 看到的是这一路周边居民的热情和欢迎,所到之处,都会有人早早算好时间、等在路边或休息区,有人打出欢迎标语,有人一家出来做表演,也有人自发准备



crom, 香港人,前跨国公司高管,现普拉提教练、防艾志愿者,2013 年“爱滋徒步”活动筹款冠军。



好水和零食,骑手们经过时自然倍受鼓舞。

可早在骑行活动刚开始的几年,并非如此,骑行队伍曾受到强烈的排挤,周边群众示威、抗议甚至恶语相向。“这是一个慢慢的改变过程,当他们看到这个骑行活动每年都在坚持,这些人这么努力、这么辛苦,他们就反对者成为支持者,这是一个

很奇妙的变化。”crom 的语气中透露出羡慕,“多希望国内也能有这种改变的过程。”

因为是观摩学习的身份,crom 被组委会委派的工作每天不同,搬水、准备晚餐、物资分类等等,基本上枯燥繁重。他觉得自己很幸运,因为每天接触的还是不同的工作,基本上志愿者们七天的工作是固定的,远比骑手们辛苦得多。

比如搬运货物,就搬了三天。“6 月 1 日骑行正式开始,所以 29 号我们就把这七天要用的东西都分好类、安排妥当,放到大卡车上,要搬运的东西很多很多,一共搬了三天。”crom 回忆。比如专门负责饮用水的一队人,就要把这 7 天的水都准备好装车;做早饭的志愿者每天要凌晨 3 点起床,准备近三千人的早餐。所有工作繁琐,却极其细致、井然有序。

“我能感受到他们很用心地在做事,哪怕是每天重复的体力劳动。”crom 很想知道是为什么:一个志愿者说,他已经因为艾滋病而失去了 28 个朋友,所以这件事情跟他息息相关;一位 24 岁的小伙子告诉他,因为自己很健康,才想用这种方式告诉身边感染 HIV 的朋友“我是支持你们的、是爱你们的”;还有一位老阿姨,是队伍中唯一一个连续参加了 21 年的骑行志愿者,她觉得

改变这个世界和自己息息相关。

“我每天都跟很多人交流,发现不管男女老少、健康人还是感染者、同性恋还是 LGBT,他们都把 HIV 当做是自己身边的一件事情,跟自己联系很密切的一件事。”crom 觉得,这可能就是答案,生病不是最可怕的,最可怕的是被孤立起来,所以消除歧视、让感染者感受到理解支持是最重要的。

在骑行结束的仪式上,专门有一个环节,骑手们列队、夹道欢迎所有的志愿者入场,并且会不停地“这几天你们太棒了!”“你们是最辛苦的”。crom 也是志愿者之一,这样的感谢让他很有荣誉感和成就感,“那一刻觉得这些天的累都值得了。”

内地、香港筹款大不同

在香港出生长大的 crom,近些年才因为工作的原因来到内地,“之前我不是很理解筹款有什么不一样,现在体会到,在内地做公益项目的筹款是很难的。”crom 说。所以,他的筹款目标都是亲朋好友,认识的人出于对他的信任,就会慷慨捐赠,而他几乎不能跟不认识的人开口。那样会被问“你是干什么的”。“不认识你为什么相信”,这样的场景想一想 crom 就觉得很难。

在香港,不论是学生还是明星,在街头为公益组织募款是司

空见惯的事情,电视里的黄金时间段也会有关于艾滋病的公益广告。“如果今天街上有哪个机构要公开募款,报纸或电视会事先登出通告,大家也会知道了,而且一个机构一年只有一次街头公募的机会,他们会很珍惜这个机会。”

去年是 crom 第二次参加爱滋徒步,首届的时候他以微弱的差距成为募款第二名。于是他在去年的募款过程中,也搞了一些活动。“我跟酒吧去谈,当晚 6 点到 10 点的营业额有 40% 捐给爱滋徒步活动,后来来了很多朋友捧场,酒吧老板就说,给你们 50% 吧。”这件小事令 crom 很感动,他确信,只要真心诚意地做一件事,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“再比如,一位朋友是新西兰人,他看到我做的事情之后,就动员他的家人在新西兰那边做了一些筹款捐过来。”

crom 预想,今年再筹款肯定更容易,因为这件事情他已经坚持了两年,还去美国学习观摩了艾滋骑行,更多人会因为看见他的坚持而相信他。对于筹款,他的心得体会就是,要花些心思,比如要带头捐款,或者做些活动。“今年我打算在家里做一桌丰盛的菜肴,都是有机健康的食品,邀请朋友来吃饭,同时募款。”crom 的想法倒是和巴菲特与比尔·盖茨的慈善晚宴异曲同工。

自己勇敢,更多人才靠近

■ 本报记者 闫冰

最近这几天,小强和同伴们陷入了微博上的一场“口水仗”,对方是一位微博认证为复旦大学的医学博士的女生,因为是强烈的“反同反艾”人士,她开始对小强等人进行来势汹汹的口诛笔伐。“因为她有三万多粉丝,所以肯定会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和错误引导。”

一方面,小强和她辩论、借机宣传普及艾滋病知识,一方面小强也清醒地认识到,即便是 HIV 在医学层面上不再可怕,道德评判才是人们戴起有色眼镜的重要原因,也是很多感染者对疾病恐惧的源头。

我的幸运能复制吗?

小强记得,2007 年的时候,他被查出感染 HIV 病毒,现在,他可以跟所有人坦然承认这件事,并且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,但并不表示,没有经历过艰难的时光。正因为经历过那样一个孤独的时期,所以,他才选择走上防艾的公益道路。

“那时候,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疾病其实不可怕。2007 年到 2008 年的那一整年我过得非常艰难,非常难熬,甚至因为害怕不敢去网上查找资料,因为我所能找到的东西都是很恐怖的。”那时起,

小强就意识到,对于那些新发感染者,需要有人正确地引导他们,告诉他们正确的专业知识。

彼时,知识的缺乏加上恐惧,使他对自身的身体情况没有很好地重视。2008 年,因为艾滋病引起的感染,小强住进了医院,并且医院下了病危通知。不得已的情况下,小强把自己生病的事情跟家人、朋友坦诚相告。

“当时同事过来看我,那个医院是个定点医院,所以他们都意识到了我生病的原因。但是我至今都觉得我是很幸运的。”令小强出乎意料的是,同事们对这件事的认知还是比较冷静理智的,当时的单位领导还专门为此开了一个会,问他们怎么看待身边有人感染 HIV,跟同事们分享了关于艾滋病的资料,一起探讨接下来的事情。所以等小强出院,回到单位后,大家并没有对他表现出异样。

“我真的很幸运,但是我的幸运其实是不可复制的。”小强知道,一般感染者可以得到家人的支持、朋友的支持,但是很难得到同事们的理解。

住院期间,小强看到很多感染者因为生病没钱治疗而放弃或生活陷入困境,也有些病人需要一些帮助,哪怕仅仅是理解和安慰。不止是周围的人、整个社

会,连感染者本身对这个疾病的认知也是远远不够的。

在了解了 HIV 在医学上没有那么可怕之后,疾病也开始带给小强一些积极的改变:改掉了不良的生活习惯,积极健康地生活,保持好的心态并且投身公益。“这也是我为什么愿意站出来的原因,在感染者社区里面面对很多问题,可能我本身就是感染者,所以更能理解感染者的处境,总要有有人站出来为感染者发声,才能改善整个社区的状况。”

自助与助人

小强记得自己第一次筹款,是帮助一个到上海看病的广西学生。他并不知道自己是 HIV 感染者,一次踢足球导致骨头坏死,到医院检查后,才知道因为感染 HIV 得了肺结核疾病。他是一个农村家庭出来的孩子,小强记得,他的父母为了让孩子看病没钱吃饭,在上海治疗期间他们就买了两大袋子红薯,每天只吃红薯。

“那个孩子非常朴实,当时他面临的问题就是医疗费用接不上,要被赶走了,那之前的治疗就前功尽弃了,他无法继续学习,甚至会残疾,那对他们家来说都是雪上加霜。”于是,小强和

几个朋友就帮他发起了网上募捐,半个月的时间筹到了 10 万元。令小强开心的是,广西的孩子现在不仅腿疾治好了,也改变了他的人生。“他以前就是想毕业后找一份安定的工作,后来跟我们说,他也想专门做一些跟防艾相关的公益活动来帮助别人。”

对于如何筹款,小强有自己的心得,一定要对募款对象负责,要让对方知道钱的去向。“当时每天孩子的花费,我们都打印出来,盖上医院的公章,在网上公布,接受捐赠的账号也是医院。”

包括去年参加爱滋徒步活动,小强也做了一些功课。2013 年第二届“爱滋徒步”活动,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、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和上海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联合主办的,有了国字头基金会的加入,小强认为在资金的监管使用上更靠谱。

基于自己一直活跃在微博上,粉丝大部分是感染者或者对他有所了解的志愿者,所以他的筹款平台就放在了微博上,并且,将他了解到的活动背景、资金流向、捐款方式等做了一个漫画海报,让他的筹款对象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个活动。“我募集的所有钱,是要对我的募集对象负责的,如果钱糊里糊涂地花出去了,那么对这么多人来讲可能是

一种伤害。”

这几年,小强的防艾行动从在公益组织中直接提供关怀帮助,转移到了大学讲台,因为参与了福特基金会资助的项目,小强在上海复旦大学、上海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等多个高校开展安全性教育的培训。“这些年我做这项工作很有成就感,我们一直是很赤裸地把话题摆在台面上,开诚布公地说出来,开始的时候学生们很害羞、不敢说,但是现在已经很好了,几次培训后我们还发展了一批学生志愿者。”当然,也有一些学生会在培训后偷偷地找到小强,因为感染了 HIV,他们跟别人不敢说,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“那我就告诉他去什么医院、怎么表述,并且鼓励他们独立完成去医院看病,这是迈出的第一步。”

小强说,总要有有人勇敢地站在明处,那更多躲在角落的感染者就会靠近过来。

艾草小强,上海人,29 岁,HIV 感染者,国企员工,上海“爱的家园”互助小组志愿者、上海高校安全性教育讲师。

